

天时·地利·人和：博弈之诀

——以安元奎长篇小说《乌江风云》为例

唐竹英

天时、地利、人和，自古被认为是战争博弈的要诀，而人和则是“诀中之诀”，安元奎长篇小说《乌江风云》在书写夜郎军与宋军双方的对峙与交战时就充分地演绎了这个观点。

在大宋军征讨之前，夜郎国的确独占一方，自成一霸，城高堡坚，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诸种有利因素的。“跳蚤之流”着实不可小觑。大宋当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处在历史紧要关头，却出了一个治国欠方、书画有才的国君——宋徽宗。

宋徽宗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奸佞小人，任由他们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扰乱大宋官员选拔，祸害忠臣良将，打压元祐党人，将许多正直清廉的官员排挤出朝。奸党一手遮天，致使大宋朝政更加腐败，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宋徽宗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不断加大老百姓的负担，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而蔡京等人更是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使得国家经济走向衰颓，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宋徽宗君臣的腐朽统治，引发了多地的农民起义，夜郎割据一方，擅封国号，自立为王，即是其中的一种。政治腐败，经济衰弱，社会不安，也让国防不稳，军队缺少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还热衷于“玩物丧志”。作者在小说中对宋徽宗擅长书画的事情费了不少笔墨，肯定了他的艺术天赋，但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惋惜，如果他不是皇帝那该多好。

安崇诚与天台寺智隐大师有过一段谈话，是关于宋徽宗书画方面的。智隐大师称宋徽宗是“书法大家”。熟知他的画中名作，认为其作品有“黄筌遗韵”。最为称道的是他的花鸟画，他评价：“用笔精练，准确传神。尤其画鸟时用生漆点睛，凹凸效果立显，简直栩栩如生。”在称赞过后又有些隐忧，他说：“身为皇帝，不爱江山爱丹青，难免有所偏废。长此以往，国家堪忧。”这也是作者站在历史角度发出的喟叹。干不该，万不该，这份天赋被赐在了一国之君的身上。如果他不当皇帝，那么历史上将会多一位天赋异禀、成就卓越的书画家。可对于一个应当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成天只顾画画，就变成了不务正业，以至貽误国事。君天下者的古代，国运的好坏往往与当朝皇帝的英明与否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他们的艺术家皇帝，方外之人智隐大师痛心疾首，毫不避讳地对出兵夜郎的主帅安崇诚说起了自己的洞见，认为“北方金人才是虎狼之族，啸天之声不过跳蚤罢了”，预言“不出数年，金人必将南下。亡宋者，或金人也”。

君主昏庸，对大宋不利，对“跳蚤之流”的啸天则有利。当时的大宋外有狼族虎视眈眈，内有奸臣阻塞视听，还有皇帝疏于朝政、玩物丧志，处于内外交困、由盛转衰的时期。就天时来说，大宋处于弱势。

夜郎伪国最大的利是“地利”。夜郎远离大宋都城，居偏僻一隅，倚仗乌江天险，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想管也难管。关于乌江，近年来，有很多作家写了许多作品。其中就有贵州作家聂其康写的《乌江风云 1935》。小说写的是红军“强渡乌江”的故事，回答了“距血战湘江仅月余，是什么力量让红军不惧天险渡乌江，无畏生死觅黎明”的问题。同样是写“乌江风云”，安教授写的则是北宋时期的故事。正可以说明，乌江自古以来便是天险，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在战略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小说中多次说到思州城临江而建，背倚山梁，城外有四大关隘，城内墙高门坚，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对宋军来说，却是劳军远伐，人疲马羸，面对的是陌生的乌江天险，是熟谙本地关卡要隘，熟谙水战、船战且逃避有术、训练有素的强大对手。

小说第五章写龚滩所在之处的乌江峡谷：“因唐代山岩垮塌，此处形成一处天险。数里长峡之中惊涛拍岸，常有樯倾楫摧，翻船无数，行船人谈之色变，号称乌江滩中之王。乌江从峡谷中流过，上达思州，下至涪州汇入长江，地势险要，上下船只都要在此卸货，纤夫、背帮将货物背过长滩，再重新装船，称为盘滩。”正因据守当地天险，料宋军行水路必是“逆水行舟，慢如蜗牛”，夜郎军才自信地以为“只要以逸待劳，他们终有无可奈何”。虽然后来被宋军接连攻克下祐溪、大堡、龚滩、潮砥等战略要地，但他们还拥有军事要塞之地思州城。思州城位于乌江要冲，是连接夜郎与外界的战略要地。

小说第七章写思州古城：“古城前临天险乌江，两岸群山壁立如同天然城墙，这种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也许是当初选址于此的关键原因。东南西北分别有四大关隘：大岩关、小岩关、德胜关、太平关，既是古人出入思南府城的四大出口，也是古

城的军事要塞。这些关隘彼此呼应，拱卫着思州。一旦在各个山头燃起烽火，几十上百里闻风而动，半个时辰便可蜂拥而至。”思州城具有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这使它在战争中能够有效抵御来犯之敌，成为重要的军事堡垒。与此同时，它也给当地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保障了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使当地变得富足，为增强兵力提供了支撑。可见，夜郎伪国自恃强盛，自定国号，自立为王，也是因为得地利之便而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一般来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势力往往会凭借经济实力，聚集军事力量，招兵买马，壮大势力，借机起兵造反，与朝廷相对抗，以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进而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说，思州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经济要塞，是夜郎军队

的后勤保障所在地，是他们的粮仓和钱袋子，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争夺思州城，就是争夺地利。双方都知晓其中的利害，所以，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双方都是主帅亲自指挥，双方军师、将帅都各为其主参与其中，战前出谋划策，攻守时亲力亲为，唯恐一不小心，马失前蹄。争夺思州城在小说《乌江风云》中是很重要的情节，内容极其丰富，刻画极为细腻，描写极其生动。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争夺思州城则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再来说说“人和”。当时乌江沿岸子弟纷纷入彀，加入夜郎国军队，使得夜郎兵为数众多，声势浩荡，再加之“四天”以迷信愚弄百姓，使百姓亦成为其拥趸，当然也不乏其用武力迫使百姓就范的情况。可见，夜郎军不差人。如果没有人手的

话，他们也不可能兴风作浪，自成一个小王国。从与宋军对峙的时间之长上，也可以看出，他们人员充沛，势力雄厚。从上述保卫思州城的情节中，也可见其“人和”的一面。

宋军当然也具有“人和”这个因素，小说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宋军的“人和”，并侧重于用主帅安崇诚的为人和此次征讨的性质来进行表述。安崇诚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有儒将气度，有仁者风范，有战略眼光，有慈悲心肠，是一位难得的能臣良将，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关键是，良将帐下还有一批良才，他们个个英雄虎胆，甘为保国头倾奔身、热血洒地，人人都谋略斥膺，勇武在身。而且，他们都能听从指挥，唯统帅马首是瞻。而此次征讨的性质，也是正义的，元正是为止戈而战、止裂而战，是为捍国威、固金汤而战。战争以人为本，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在人贤，在人正，更在人和。大宋在奸臣当道、国力日衰的时候，能派出一支军队讨伐叛军已难能可贵，而其主帅、军师及将士还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和作战智慧，更是令人钦敬不已。

安崇诚颇有浓厚的仁者心怀。当他目睹横七竖八的尸体和痛不欲生的伤员，不由面色凝重，长叹一声：“都是大宋子民，骨肉相残，情何以堪？”由己及人，正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儒家主张仁爱，孔子说的“仁者爱人”，体现的正是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而“恕道”则除了体现仁爱之外，还有理解，还有宽容。他是武将，也是儒将，有着仁者的心胸与气度。当他听说夜郎有支奇怪

的军队，队伍里全是男孩，且平均年龄不大，不由心怀仁德，特意嘱咐属下：“对这些童子军，我们要手下留情。”鄧下杨勇道：“即使打死我们的人，也不能以牙还牙吗？”安崇诚道：“他们还没长大，肯定打不过成人。这些孩子是思州的未来，将来打仗结束后，思州的建设还得靠他们。”他认为人是一国之本，把人杀光只打下一片不毛之地是没有用的，要收服一方，使得地方上长治久安，就必须让百姓心服口服。虽然那些童子军是敌对方，但那也是受“啸天”那些反贼的唆使，而那些反贼终究是会灭亡的，只有让孩子们归顺大宋，才是为思州计深远。安崇诚的爱已不仅仅是为对一人一物的小仁小爱，更是为天下、为江山社稷着想的

大仁大爱。他熟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又学习三国“智绝”诸葛亮明“七擒孟获”的做法，用计谋擒王并降服了童子军头领“毛崽”。诸葛亮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用刚柔并济的手段降服孟获，平定了南中叛乱。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凭本事抓人，又以“仁感人”“以德服人”。安崇诚自然深谙其道。毛崽年岁不大，却也懂得宋将领对他已施尽仁义，毕竟抓了他三次，都没有杀他。这与其说安崇诚用的是战术，还不如说他用的是心术、仁术。天台寺智隐大师就曾评价安崇诚：“将军惩恶扬善，所行正道。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

法，正法亦邪。一切唯有心造。”又道：“积德虽无人见，行善自有天知。”行正义之法，出正义之师，护正义之理，自然得人心，而得人心者得天下。书中人物安文曾说：“兵法说，敌人既得地利，便不可与其争地。”安崇诚同样也熟知其道，不可争地，那就先争人，争取天时与人和。而争人，就必须施以仁道，以怀柔政策使其归顺，使其为我所用。在兵法上，这是一种“仁”，更是一种“智”。它有着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有着对道德原则的把握与践行。战争也需要道德智慧，收心有时比攻城更为有效。安崇诚的大仁大爱，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大德，不是一种大信大义呢？他深知，在天时与地利都不占上风的时候，争取“人和”就成了战争取胜的决定因素。《乌江风云》在刻画仁爱之师、智慧之师、信义之师上，与侯乃铭长篇小说《黔中魂》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也曾写过有关《黔中魂》的评论文章，两部书加以比较研究，就会发现铜仁乃至贵州的作家，在写战争时，都或多或少地把儒家的仁爱思想或信义精神渗入其中。

小说从多个方面来表现“人和”这个关键因素，其中“舞龙”那个情节，让人感受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写塘头舞龙，内容详细，过程具体。不仅写出了龙灯的种类、特点，扎龙灯的材料、方法，舞龙灯的动作、套数，还特意向人们介绍了马马灯、狮子灯、蚌壳灯，还有被称作思州人拿手好戏的花灯。这些都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写这些，作者有多种用意。其中一种就是表明和平情况下的思州，百姓们是有自己的喜乐方式的。如果没有战争，百姓安居乐业，那该多好。谁也不想发生战争，但只要

有反叛、分裂的行径存在，战争就在所难免。要收复江山，要恢复国家一统，就必须战争。写舞龙也是为了写战争，是为了写战争中的敌我博弈。宋军利用舞龙之机，利用当地百姓的智慧和力量，内外夹击敌军，攻下塘头、大屯和小屯。舞龙别具深义。它是官军与百姓配合着舞的，正说明，安崇诚率领的宋军已经取得了民心，得到了“人和”这个至关重要的取胜条件。

小说里写了很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使用了很多种战略战术，如围城打援、调虎离山、火攻法、箭攻法、人海战术、空城计、反间计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将宋军与夜郎军之间的攻守拉锯写得扣人心弦、趣味横生和引人入胜。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刻画，小说主题也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而这些战略战术得以实施，战争得以取胜，关键还是在于人的力量，在于“人和”优势的显现。

宋军在天时、地利两方面因素较弱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人和”这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夜郎军中的“骂天”过于轻敌，因为大、小屯固若金汤而自鸣得意。他却不知，他得了地利却丢了民心。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宋军在分析大、小屯的地形地段时，从百姓计，从盐粮计，充分考虑了百姓与商人的利益，是所谓“为民”。夜郎军占有、控制大、小屯，于商人不利，于百姓不利，可见他们是失了民心的。攻下大、小屯是形势所趋、商家所望、百姓所盼，是顺民意、遵天意之举。

可见，“人和”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得“人和”，则可扭转缺天时、少地利的弱势。古人诚不我欺，孟子曾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乌江风云》一书中，作者用事实证明了“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正确性。抑或，作者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来建构作品的。

小说《乌江风云》基于国家史实的宏大框架，又借助地方民间传说，建构起一个新的地方叙事策略，从而实现宏观历史与微观叙事的巧妙结合。作品既展现了大宋王朝与地方政权风雨腥风的斗争史，又适时展现了当时的政治生态与人文风貌，运用全景式与特写式相结合的镜头以及俯视与平视相结合的视角，较为立体地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乌江风云”。小说以叙写战争为主，却处处彰显着儒家的仁爱思想，试图用儒家仁爱思想来“铸剑为犁”。小说尊崇传统观念，把天时、地利、人和看作是博弈之诀，而又把“人和”当作最为重要的因素来书写，可以说，“人和”是敌我博弈之中的“诀中之诀”。虽然小说临近结尾时说“这是一场并不完整的胜利”，可就是这样一场胜利，它不仅凸显了儒家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还对推进民族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终归，这是一场胜战，是一场凝聚聚军心、民心取得胜利的战争。

读唐诗信笔

杨村

上接17日本版

五十九首李白古风中，第二十四首叫《大风扬尘》。我读到时，有四句直逼心胸，令人遐想、难忘：“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休惕。”有点像他在《白马篇》里写的“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而在古风其四十六首《一百四十年》又写“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按今人的析诗方法看，它叫叙事诗。它描绘了斗鸡者的形象是“冠盖辉赫”，而路人行过，则“皆休惕”。何也？因斗鸡者皆贵族豪门子弟，深受皇上器重。皇上为何器重斗鸡者呢？趣味相投。那时正值唐玄宗当政，唐玄宗酷爱斗鸡呀。更可恨的是那些斗鸡者有恃无恐，个个财大气粗，飞扬跋扈，直令行人惊心胆寒。

这个世道听起来荒诞，但却是真实的。你不禁想起“吴王爱剑客，百姓多创痍；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的事情来。不，就说《水浒传》里的那个高俅吧，它不就是一个浮浪子弟，踢得一脚好球，被端王看中嘛。端王又是一路平升，做了天子，高俅也随之入宫，做起了太尉，硬是享尽一生华富。由此可见，人之患非无才，而患之无与上峰之好也。这就令多少才大者扭曲，放下自己的独立人格，而追逐主子一世，投其所好，皆因权与利所惑。我不得不感叹：“人人口咒功名恶，个个犹争富贵名。”然而殊不知，世无常胜之道，当主子垮塌的时候，一切也玩完，于是树倒猴猕散，摧枯拉朽。这个，你又不是没有见过。真是“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瀾”（古风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

其实，李白是多对时政不满，看上去是非常有骨气的人，放任狂荡。然而，他其实也克服不了人性的一项弱点，就是得势便猖狂。比如他写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你说狂不狂？狂！可是，当他受到唐玄宗“爱重”时，他会志得意满。于是李白写出“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来。李白的人生高光时刻，应是天宝元年，那时李白岁庚巳四十二，由好友吴筠的举荐（一说是贺知章荐），被唐玄宗下诏入京。临行前他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他惊喜得“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读到这里时，我并没有为李感到高兴，反而为牵着父亲衣角活蹦乱跳的儿女难过。貌似父亲要去做官了，从此家贫得救。哪知，父亲既无城府，又不懂得藏锋芒，也无勾心斗角的职场经验。屁股没有坐热，就被李林甫们他们嫉妒、排挤、使坏，被一脚蹬下，逐出京都，一家人空欢喜一场。虽是“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不屑与斗鸡走狗者为伍，可内心却是“弹剑作歌秦苦声”（《行路难》其二），无可奈何，悲催得很。

由此可见，人性的复杂性之一斑。好在李白才华盖世，留下不朽诗篇。生时落泊，死后无疆，英名灿烂。我是比较喜爱李白的，耿直啊！

越来越觉得，李白的两面人格非常凸显。我过去很欣赏和佩服他的放达、狂傲，睥睨群雄，看上去洒脱得要死，“钟鼓饕玉不足贵”，“径须沽取对君酌”（《将进酒》）。现在，我却觉得李白也不是爽快之人。我这么说，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对事对人捏放犹疑，纠结不止，拎不起而放不下。虽是重情重义不忍伤，却是人生的痛苦之根，终究“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心结这么重的人，就会难免患得患失，哪怕才高八斗，朋友也终究会敬而远之。一件小事唠叨到死，写到死，有意思吗？和这种人在一起，你能保证没有一句话得罪他？稍有得罪，他就记恨你、写你、骂你，有意思吗？

譬如说，他收到唐玄宗的“紫泥诏”，要进宫做官了，就忘乎所以写下《南陵别儿童入京》，兴奋得“高歌取醉”，“起舞落日”，自喻为朱买臣，告别妻小入秦。可是李白又改不掉放浪形骸、狂傲不羁的习惯，那个地方怎么也适合作诗人？你是暗喻唐朝昏庸腐败，政局不定，就像波瀾一样动荡；你是暗喻梧桐应栖鸳鸯，桡桡应巢燕雀，而今却黑白倒置；你是一直揪住庙堂的黑暗和明争暗斗，而一味发泄心中的块垒。世上哪有那么遵循清晰的逻辑？

然而，不就是一个翰林侍诏吗，或叫翰林供奉？——照后来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御用文人罢了，有那么值得你记仇一辈子么？你仗着自己的才情，做着自己的诗人，纵情驰骋，逍遥自在，终身捍卫自己的人格，何患之有？李白有一首诗叫《登高望四海》（古风其三十九），他写道：“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瀾”，“梧桐巢燕雀，桡桡栖鸳鸯”。就是把自己的心结袒露无遗，这种性格，你怎么干得过老谋深算的李林甫之流呢？你是暗喻唐朝昏庸腐败，政局不定，就像波瀾一样动荡；你是暗喻梧桐应栖鸳鸯，桡桡应巢燕雀，而今却黑白倒置；你是一直揪住庙堂的黑暗和明争暗斗，而一味发泄心中的块垒。世上哪有那么遵循清晰的逻辑？

恕我直言，李白您是有点执迷不悟，亏你在朝廷里呆了两三年。像你这种眼睛揉不得沙子的人，就是活到二零二三年，命运依然无法改变。庙堂还是那个庙堂，江湖还是那个江湖。我看你的古风五十九首，始终是骂骂咧咧，有卵用！

世人有所得必有所失，你既想做官发财，又想做不朽诗人，天下好事独占，岂有此理？

韩愈的古文运动，大致就是倡导做文章师古而不泥，主张为文的自由创新，尤其在文辞形式上。这是至今为止未有超越的最高创作主张，除非迂腐或偏爱八股者——花拳绣腿华而不实的炫技者除外。不过韩愈的思想是很遵循道统的，对做官的慨叹似乎也没有超出常人。比如《山石》末句：“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偏促为人羶。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貌似厌弃官场，而向往流水清风的快乐。这是为官者的通病。他的另一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甫》，却并不那么洒脱：诗赠张功甫，既安慰友人，又宣泄牢骚，实则是同命相怜，惺惺相惜，未了还是把“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的官运多舛，归结为“人生由命非由他”。这其实是一种哀叹，放至当下又如何呢？一样一样的！那时韩愈和张功甫，都被贬遭谪，而且新皇继位大赦天下时，他们的名单却被地方官压在案底，一贬又贬，只得感叹“天路幽险难追攀”。这不是也把“回朝”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吗？

由此可见，世易时移，人心飘荡。为官的人，哪怕像韩愈那种巨儒，官至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心中所想的，还是以自己的升迁为要义，人民至上可能还是要打折扣的。

我昔日在州机关有个好友，那年要下县任职“锻炼”，其心戚然，有被贬谪的慨叹。他的父亲是很想得开，安慰说：“去做县太爷啊，又不是发配边疆。”我的朋友才释然。他给我讲述这件事时，并不顾及我身处偏乡的感受，于是我为之赋诗云：“此别为县丞，何故悲刘柳？”

韩愈和张功甫曹被贬到临武、荆州，毕竟是要去做官太爷，都只想着自己官运不顺，害怕那里的虫蛇腥臊，怎么不想想当地百姓贴着土地过日子，怎么一代又一代过下来的呢？（待续）

诗联喜诵勤耕者

任若锦

七绝·读黎应全《走向黎明》

斩浪乌江志不宁，意坚帆远闯黎明。
万难千险都磨尽，浴火涅槃牛建成。

七绝·读张子勇

《乌江流域实现“中国梦”的路径研究》

析解河山料事神，奇思妙构论说新。
匹夫也酿中国梦，奉献尧天一片心。

七律·电影《十八洞村》观后

撑持不易奔艰难，笃守心中一片田。
勤事农耕播种梦，愿留乡土志攻坚。
扶贫精准关怀远，观念革新衣锦全。
当代愚公同奋进，劬劳开创舜尧天。

七律·读安元昌《抚衷的折痕》

读罢《折痕》泪水浇，仰天长叹痛心寮。
回归人性三春暖，夙愿真情一世彪。
可恨路边当恶鬼，笑将残志做英豪。
私囊害己身先死，自立绸缪悟九霄。

七律·读田夫《野生代》

史苑求真启后昆，笔端情静动人心。
为仁知礼求根本，妄大贪婪是祸因。
学会感恩离苦海，秉承关爱佑乾坤。
红尘百炼千锤度，一世宽容总有春。

七律·贺益富《逸夫诗词》第三卷付梓

才见诗峰双亮翅，又听文苑弄箫笙。
青春有意书山驻，岁月多情墨海耕。

壮志百年圆梦想，丹心千载付鹏程。
从来豪胆谋高艺，最爱瀛寰唱大风。

贺安万红《童歌沧浪》付梓

倾意倾情，秉中华文化，诗书合璧鹏程远；
依规依矩，逗时代风云，人品同修心底宽。

题中华经典《礼记》

心动于情，规范制成开社稷；
哲思在理，仪则集就睦邻邦。

题中华经典之《易经》

集万载大成，观天文，推“八卦”，释太虚，立德循道；
取三才智慧，察地理，辨“五行”，阐命运，扶世绎方。